

清代书院藏书制度的现代学术转译 与历史镜鉴

——以图书采选与编目体系为中心

盛文迪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要

清代是中国古代书院藏书事业的高速发展时期, 书院藏书从原先的零散化、随意化的发展状态, 形成了体系完备、规制严明、实用性极强的藏书运行体系, 其中书籍采购与分类编目是核心环节, 集中体现了清代书院的治学理念与藏书方法。本文以大梁书院、仙源书院、文正书院、中江书院等清代典型书院的书院志、藏书章程、藏书记及传世藏书目录为核心史料, 系统梳理清代书院藏书的采集准则、资源获取模式与编目管理体系, 深度剖析其藏书实践的核心特征与时代演变逻辑。研究发现, 清代书院藏书形成了实用至上的采集原则、购刻协同的资源拓展机制、规范且适配的编目体系三大核心特质, 晚清时期更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完成适应性革新。厘清清代书院藏书采购与编目的制度体系与实践经验, 既能丰富古代藏书史、书院史的研究内容, 也能为当代文献资源建设、古籍整理与目录学实践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

清代书院, 书院藏书, 图书采购, 图书编目, 藏书制度

Modern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ical Lessons of the Book Collection System of Academies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Book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 Systems

Wendi She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Wuhu Anhui

Received: July 26,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文章引用: 盛文迪. 清代书院藏书制度的现代学术转译与历史镜鉴[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5): 1139-1145.
DOI: 10.12677/isl.2026.105133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mark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for book colle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Moving beyond their previously scattered and haphazard state, these collections evolved into a comprehensive, strictly regulated, and highly practical management system. Among these processes, book acquisition and classification/cataloging were central components, vividly embodying the academic philosophy and collection methodologies of Qing-dynasty academies. Drawing primarily on historical records such as the annals, collection regulations, collection records, and extant catalogs of representative Qing-dynasty academies—including Daliang Academy, Xianyuan Academy, Wen Zheng Academy, and Zhongjiang Academy—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acquisition criteria, resource acquisition models, and cataloging management systems of Qing-dynasty academy libraries, while provid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brary practices and the logic of their evolution over tim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Qing dynasty academy libraries developed three core characteristics: a collection principle prioritizing practicality, a resource expansion mechanism combining purchase and printing, and a standardized and adaptable cataloging system.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se institutions further underwent adaptive reforms in response to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Clarifying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book acquisition and cataloging in Qing-dynasty academies not only enriche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book collec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academies but also provides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efforts in building documentary resources, collating ancient texts, and cataloging practices.

Keywords

Qing-Dynasty Academies, Academy Book Collections, Book Acquisition, Book Cataloging, Book Collection Syste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藏书是书院立院之根本，是书院开展教学育人、学术研究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兼具公共性与学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中直言，书院之得名，核心便在于藏书之所的核心定位，足见藏书活动对于书院发展的决定性意义[1]。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由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与书院藏书四大系统构成，相较于其余三者，书院藏书兼具教育服务性、学术开放性与民间自主性，是古代公共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实践形式[2]。

清代是书院藏书发展的巅峰时期，全域书院数量鼎盛时达 4365 所，覆盖全国各州县，留存的书院志、藏书规条、藏书记序、藏书目录等史料数量宏富，完整记录了清代书院藏书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流程[3]。纵观清代书院藏书发展脉络，其核心工作始终围绕文献采集、资源拓展、分类编目三大环节展开，形成了区别于前代的规范化、制度化运行模式。清初书院藏书恪守传统经学治学需求，乾嘉时期依托考据学发展完善藏书标准与目录体系，晚清伴随中西文化交融、社会变革，主动吸纳西学、时务文献，完成了藏书体系的革新发展。

当前学界关于清代书院藏书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学宏观研究范式，主要聚焦书院藏书的发展脉络、

历史沿革、文化价值与地域特征。邓洪波系统考据了中国书院藏书制度的整体演变脉络，构建了书院藏书史的研究框架；肖永明等学者重点探讨了书院藏书与地方文化、学术传承的内在关联。部分专题研究虽涉及藏书采集、编目、借阅等具体环节，但多止步于史料梳理与史实考证，对清代书院藏书自身的制度逻辑、演变特征、实践方法的系统性挖掘不足，且多数研究过度侧重古今对比应用，弱化了清代书院藏书本身的史学价值。基于此，本文以采购与编目两大核心环节为切入点，依托清代书院各类原始史料梳理藏书实践的规制特征、运行模式与时代演变脉络，挖掘藏书制度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弥补现有研究重史实梳理、缺少辩证反思的不足。以辩证视角还原清代书院藏书运行的真实历史面貌，提升研究的历史客观性与批判深度。

2. 清代书院藏书采购的核心规制与实践特征

清代书院以培育人才、传承学术、经世致用为核心职能，这一定位决定了其藏书采购摒弃了私家藏书的收藏性、官府藏书的政治性，形成了以实用为核心、质量为支撑、多元为路径的采购体系，构建了适配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文献资源体系。其采购实践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采集标准的实用性、资源获取渠道的多元化。

（一）采集准则：实用为先，兼顾内容适配与版本精良

清代书院藏书采购始终秉持“为学而藏、为用而购”的核心准则，拒绝冗余虚浮的无用典籍，所有采购行为均围绕书院治学需求展开，且随时代发展不断优化适配，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在文献内容筛选上，清代各地官办、民办书院均形成了明确的采购标准，其中大梁书院《购书略例》^[4]的规制最具代表性，成为清代中后期书院藏书采购的通用准则。其明确提出“书籍期于有用”的核心原则，将藏书核心划分为性理、经济、考据、词章四大类，精准匹配清代书院义理研习、经世致用、文献考证、诗文创作的核心治学需求，同时明确优先采购精要实用典籍，摒弃繁杂冗余的坊间杂书^[5]。

值得关注的是，清代书院藏书采购标准并非固守传统，而是随社会思潮变革动态调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时期，大梁书院并未拘泥于传统科举典籍与理学文献，主动增加经济时务类书籍采购比重，贴合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适配新式人才培养需求。晚清中西文化交融加剧后，书院藏书采购进一步突破传统学术壁垒，形成“学无判中西，择取有用而已”的全新采购理念。兴化文正书院明确提出，藏书不仅要助力师生贯通古典礼籍，更要吸纳时务、西学文献，弥补传统学术的局限，以实用为唯一标准打破中西学术隔阂^[6]，这一理念标志着清代书院藏书采购准则的近代化革新。

在版本筛选层面，清代书院采购兼顾实用性与传承性，高度重视典籍版本质量。由于古代文献载体易受潮湿、虫蛀损毁，且书院藏书需长期供师生研读、代代传承，优质版本成为采购的重要硬性标准。大梁书院明确规定采购书籍优先选用官局新印版本，此类典籍纸质坚韧、刻印精良、校勘严谨，可长期保存使用^[7]。仙源书院则针对晚清兵燹之后古籍损毁、旧刻稀缺的现状，提出珍稀旧刻典籍“因罕见珍”的采购原则，主动搜求散落古籍，兼顾典籍的实用性与文献传承价值^[8]，充分体现了清代书院藏书采购兼顾当下治学与后世传承的双重考量。但这套以实用为第一标尺的采购准则自带难以调和的局限。书院所有购书活动围绕经学研习、科举备考、经世治学、诗文创作四类核心需求展开，戏曲小说、民间杂记、小众方术、冷门金石小品等缺乏直接学术功用的文献会被直接排除在外，人为造成馆藏文献结构单一，难以完整留存古代多元的文献生态。即便晚清开始主动收录西学与时务书籍，取舍标准依旧以能否培育新式实用人才为底线，偏向纯艺术、纯思辨、休闲阅读类的外文读物依旧不在采购范围内，馆藏文献收藏视野始终存在明显边界。

（二）资源拓展：购刻协同，构建多元藏书获取体系

清代书籍制作流程繁杂、流通范围有限，优质典籍稀缺、获取成本高昂，“得之之艰，或其书稀有，

见比河清，或酬值不给，重若山负”是各地书院藏书建设的普遍困境[9]，时常出现典籍缺货、无法即时采购的情况[10]。为破解资源短缺难题，清代书院结合地域经济、文化差异，构建了“购书为主、刻书为辅”的多元资源拓展模式，形成了成熟的藏书补给机制。

在书籍采购层面，清代书院形成了差异化的地域采购策略，适配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禀赋。对于云南等经济欠发达、书业凋零的西南地区书院，主要采取专人远赴外地采购的模式。昆明经正书院为完善馆藏，专人远赴上海、广东、湖北、金陵等书业发达地区采购典籍，累计购书数十万卷，有效弥补了本地文献资源的匮乏，保障了书院治学需求[11]。对于安徽、江南等文风昌盛、士人流动频繁的地区，则形成“官绅代购”的便捷模式。仙源书院明确利用本地士人游学、游宦四方的资源优势，委托各地士人就近采购书局精要典籍，寄藏书院，让县域书院得以共享全国优质学术资源，突破地域藏书局限[12]。异地赴外省购书、委托士人代购两种模式都高度依赖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撑，一旦官府拨款、地方士绅捐输出现缩减，整套藏书扩充计划便会停滞。西南、偏远山区经济薄弱的州县书院常年资金紧张，无力承担长途购书的人力与路费，仅能低价购入本地坊间粗刻本，馆藏数量、版本质量与江南、中原富庶地区书院形成巨大差距，区域间藏书资源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自主刻书是清代书院补充馆藏、优化藏书质量的核心辅助路径，也是清代书院藏书事业的重要特色。清代书院刻书以校雠精审、刻印精良著称，区别于坊间功利化刻书，完全服务于教学与学术研究[13]。其中河南地区书院刻书成就最为突出，刊刻内容涵盖名家注本、学术丛书、地方志书等各类文献，校勘严谨、错误率极低，成为清代书院刻书的典范[14]。书院刻书针对性极强，主要聚焦师生高频研读、市面稀缺、复本不足的核心典籍，既有效解决了馆藏资源短缺的问题，又通过严谨校勘修正坊间典籍谬误，优化了藏书质量，同时实现了优秀学术文献的整理与传承，构建了可持续的藏书资源保障体系。书院刻书本身存在极高的资金门槛，校勘、雕版、印刷全流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只有省级、府级规模较大的书院拥有充足资金支撑常态化刻书工作，多数基层小型书院仅能少量刊印基础经学读本，无力整理刊刻大部丛书与稀见古籍，购刻互补的资源扩充机制很难在基层完整落地。各地书院在落实统一藏书规制时也呈现明显分化，经费紧张的小型书院为压缩开支，放弃严谨校勘要求，直接翻印错漏较多的坊间劣本；部分民办书院藏书建设容易受到地方乡绅个人偏好影响，购刻书目偏向私人喜好，偏离书院面向全体师生治学的公共藏书定位，自上而下统一的藏书制度在基层落地过程中不断弱化、走样。

3. 清代书院藏书编目的体系规制与演变特征

清代书院高度重视编目工作，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核心功能作为治学基础，认为规范的藏书编目是引导师生治学、梳理学术脉络的关键。不同于私家藏书重收藏、轻利用的编目理念，清代书院藏书编目以服务学术、规范管理为核心，形成了规范性、学术性、适应性兼具的编目体系，且在晚清实现了传统目录体系与新式学术内容的融合革新。

（一）编目定位：以目录为治学导引，强化公共服务属性

清代书院已普遍形成“无目录则无治学门径”的共识，将藏书编目从单纯的馆藏管理工作，上升为服务教学、引领学术的核心举措。芜湖中江书院在《尊经阁记》[15]中明确指出，未经分类编目的藏书杂乱无章，会导致学者治学无门、视野狭隘，而规范的书目分类如同良师，可引导学者依据自身治学方向研读典籍、精进学业[16]。基于这一认知，清代多数书院将编目公示纳入藏书管理制度，兴化文正书院明确规定，馆藏典籍需完成分类缮写、编制目录，并公示于书院门首，面向本地士人开放查阅，充分发挥藏书的公共学术价值[15]。这一举措体现了清代书院藏书编目“管理为基、服务为核”的核心定位，也是其区别于传统私家藏书编目的核心特质。

（二）传统编目：承袭四库范式，构建标准化学术目录体系

清中期书院藏书编目以“经史子集”为核心范式，形成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四部分类编目体系，其中仙源书院《仙源书院书目初编》[17]是清代书院藏书编目的典范。光绪四年，仙源书院召集院内学者，参照传统目录学义例，编撰完成三级体系藏书目录[18]。该书目严格遵循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框架，大类设总序、小类设小序，清晰梳理每一类目的学术源流与发展脉络；各典籍条目下详细标注卷数、作者、版本、流传情况，并附解题评述，兼顾馆藏管理的规范性与学术研究的指导性。相较于官方目录，书院书目更侧重贴合治学实际，精简冗余类目、突出实用典籍，构建了适配书院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标准化编目体系，成为清代传统书院目录编撰的标杆。书院直接照搬“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体系，也继承了这套目录框架所固有的封闭性。四库分类以官方经学正统为核心逻辑，天然轻视民间通俗文献与小众专门学问，书院沿用该分类框架，进一步固化了“重经学、轻实用”的馆藏筛选导向，和采购环节实用优先的标准形成双向约束。同时编撰完整书目对学者专业能力有较高要求，中小型书院缺少专业目录人才，大多直接照搬大型书院书目类目，未结合自身馆藏特色调整细化，时常出现类目空置、著录信息简略、分类生硬粗糙等问题，标准化编目制度在不同书院之间落实质量参差不齐。

(三) 晚清革新：突破传统框架，适配中西交融学术格局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时务之学兴起，传统四部分类法无法涵盖新式学术文献，难以适配新时代的治学需求。在此背景下，清代书院主动革新编目体系，突破传统目录框架的局限，形成了兼容传统与新式学术的编目模式。岳阳慎修书院摒弃传统四部分类命名，采用甲乙丙丁新式编号体系，专门设置丙部类目，集中收录建筑、军事、航海、矿业、外交等西学实用典籍，实现新式文献的专项分类管理。兴化文正书院则采取“传统类目 + 新增附类”的模式，在经史子集传统分类之后，增设西学、时务专属类目，专门收纳新式文献。

晚清书院的编目革新，并非对传统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坚守传统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吸纳新式知识，既保留了传统目录“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又解决了新式文献分类无据的难题，体现了清代书院藏书编目极强的适应性与学术包容性，也印证了清代书院藏书随时代学术发展动态革新的核心特质。晚清书院的分类调整只是针对新式文献的局部修补，并未从底层重构传统学术分类逻辑。无论是增设独立西学附类，还是更换甲乙丙丁新式编号，西学、时务文献始终依附于经史子集传统框架，没有获得平等独立的分类层级。多数基层书院仅简单增设新式类目名称，没有对西学典籍开展版本考证、内容解题等精细化编目工作，新式目录改革流于表面形式，只有资金充足、学者云集的大型书院能够完成完整、精细的中西兼容编目改造，编目革新存在显著地域与层级落差。

4. 清代书院藏书采购与编目的历史特质与价值

纵观清代书院藏书的采购与编目实践，其在两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前代藏书体系的鲜明历史特质，承载着清代书院的治学理念与文化遗产使命，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其一，秉持经世致用的核心内核，实现藏书与治学的深度融合。无论是文献采购的实用标准、差异化的资源获取模式，还是动态革新的编目体系，均始终围绕书院教学育人、学术研究的核心目标，彻底摒弃了藏书的功利性与收藏性，形成了“藏为学用”的核心逻辑，让藏书成为学术发展的坚实支撑。其二，构建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体系，推动古代公共藏书走向成熟。清代书院通过明确的购书章程、刻书机制、编目规制，将前代零散化的藏书实践转化为制度化运行模式，形成了流程完整、标准清晰、管理规范公共藏书体系，为中国古代公共藏书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其三，具备与时俱进的革新能力，彰显传统学术的包容性。晚清书院主动追求变革，吸纳西学、时务文献，创新采购标准与编目体系，实现了传统藏书体系的革新发展，为近代新式图书馆的文献建设与目录制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础。

这套藏书采购与编目体系具备鲜明的时代优势，同时也伴随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构成制度发展的一体两面。以“重经学”为核心的采选标准会压缩馆藏文献的多元性，无法完整保存完整的古代文献谱系。经费供给差异长期制约购书、刻书工作的实际成效，统一的藏书章程在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书院落地时容易产生执行偏差与制度变形，难以实现全国范围内均衡、标准化的公共藏书建设。晚清时期对西学文献的采选与分类革新，均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下产生的被动改良，并非书院内部学术体系自发完成的重构，传统经学始终占据馆藏与目录体系的核心位置，新式知识长期处于附属地位，采选、分类层面的调整仅停留在表层修补，没能完成向近代图书馆完整知识体系的深度转型。

5. 结语

清代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鼎盛形态，其以采购与编目为核心的藏书建设体系，凝聚了清代数百年的藏书管理与学术治学方法。在文献采购层面，形成了实用至上、兼顾版本、动态适配的采集准则，构建了购刻协同、因地制宜的多元资源拓展模式；在编目管理层面，承袭传统目录学精髓，构建了标准化的学术编目体系，晚清又顺势革新，形成了兼容中西、适配新式学术的编目范式，兼具规范性、学术性与适应性。

相较于前代书院藏书，清代书院藏书实现了从随性收藏到制度建设、从单一传承到经世致用、从固守传统到兼容革新的全面升级，不仅有力支撑了清代书院的人才培育与学术繁荣，推动了地方文化遗产与文献典籍保护，更为中国传统藏书制度、目录学发展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深挖清代书院藏书采购与编目的实践规制、演变逻辑与核心特质，能够进一步完善古代书院藏书史的研究体系，厘清传统公共藏书的运行逻辑，同时为当代传统文献整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古典目录学的活化应用提供深厚的历史借鉴，让传统藏书文化的方法在当代学术建设中持续发挥价值。在肯定其制度成就与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应当客观认识到单一实用价值导向、区域经费分配失衡、传统学术分类框架束缚等客观条件给这套制度带来的短板，这套藏书体系存在馆藏多样性不足、基层执行落差大、近代革新不够彻底等固有局限，能够为当代古籍整理、文献资源建设、目录学实践提供正反双向的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 [1] 姬广凯. 清代书院藏书开放流通研究[J]. 晋图学刊, 2021(3): 75-79.
- [2] 姬广凯. 清代藏书开放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1.
- [3] 张根华. 清代福州致用书院藏书研究[J]. 三明学院学报, 2016, 33(1): 65-70.
- [4] (清)顾潢. 大梁书院购书略例[M]//陈谷嘉,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321.
- [5] 钮开芹. 我国古代书院藏书的管理及历史贡献探略[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5): 97-99.
- [6] 赖宁, 刘平. 天一阁及其“藏书文化”研究探析[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7(18): 96-97.
- [7] Ibacache, K. (2020) Building Collections through Purchase Suggestions in Academic Libraries. *Collection Management*, 45, 179-192. <https://doi.org/10.1080/01462679.2019.1666332>
- [8] Downey, K. and Zhang, Y. (2020) A Cross-Institutional Study of eBook Demand-Driven Acquisition (DDA) Use and Efficacy of Eight Large Academic Libraries.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81, 27-42. <https://doi.org/10.5860/crl.81.1.27>
- [9] 邱春姝, 张雪梅. 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思想研究——基于清代官府藏书楼的管理实践[J]. 情报科学, 2021, 39(6): 49-54.
- [10] 赵大莹. 清中前期的东堂藏书[J]. 文献, 2020(2): 55-66.
- [11] 吕艳. 中国古代书院藏书考论[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5): 64-69.
- [12] 吕爽. 明清皇家藏书比较研究[J]. 图书馆界, 2022(6): 30-34.

-
- [13] 张钰钊. 《葆醇堂藏书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 [14] 邹桂香. 国内书院藏书研究现状与展望[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7(2): 20-23.
- [15] 安徽芜湖中江书院尊经阁记附: 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M]//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70.
- [16] 姚伯岳.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3, 31(6): 103-108.
- [17]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M]//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 第 64 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28.
- [18] 邹桂香, 高俊宽. 我国书院藏书事业近代化的历程、特征与意义[J]. 图书馆建设, 2021(3): 6-13+25.